

中國經學

ZHONGGUO JINGXUE

第二十三輯



主編◎彭 林

■特稿

六經的價值論理 ○劉夢溪

經學、小學與考古學 ○馮 時

經學的歷史貢獻與學科訴求 ○彭 林

清代經學史的思考與現代啓示 ○程 鋼

■經師研究

張舜徽先生的經學文獻觀 ○周國林

論張舜徽先生《清人筆記條辨》對經學的論說 ○劉詔軍

簡論張舜徽先生經學思想的特點 ○董恩林

■經學義理

論司馬光的禮治思想 ○張凱作

道濟天下——唐文治、曹元弼二先生經學大義比論 ○鄧國光

■經學史論

《周本紀》《魯周公世家》所載周公史事引《書序》考論

——兼談司馬遷的撰史理念 ○駱 揚

盛樂舞雩與孔子“風乎舞雩”之本義 ○曹勝高

劉向“自持其《穀梁》義”考論 ○鮑有爲

■經學故訓

讀俞樾《毛詩平議》札記六則 ○郭鵬飛

高郵王氏《國語》校詁商榷四則 ○戎輝兵

■經學文獻

毛奇齡年譜補輯簡編（1682-1713） ○胡春麗

《四庫全書總目》經部勘誤舉隅 ○李堅懷

顧廣圻校修張敦仁翻刻撫本《禮記釋文》探析 ○侯 婕

20世紀熹平石經研究鳥瞰 ○虞萬里

■資訊·札記

孟子“義襲”解 ○劉青松

韓大偉著《中國經學史·周代卷》概略 ○唐光榮

長歌行——撰成《中國經學史》前三冊偶感詩自注並序 ○[美]韓大偉

校勘記補遺（一） ○[日]長澤規矩也 撰 石立善 整理

後記 ○彭 林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中國經濟學

第二十三輯

主編◎彭林

副主編◎張煥君

進書題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桂林·

圖書在版編目 (CIP) 數據

中國經學. 第二十三輯 / 彭林主編. —桂林: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2018.12

ISBN 978-7-5598-1544-6

I. ①中… II. ①彭… III. ①經學—研究—中國
IV. ①Z126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 (2018) 第 287782 號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發行

(廣西桂林市五里店路 9 號 郵政編碼: 541004)
網址: <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 張藝兵

全國新華書店經銷

湖南省衆鑫印務有限公司印刷

(長沙縣榔梨鎮保家村 郵政編碼: 410000)

開本: 787 mm × 1 092 mm 1/16

印張: 17.25 字數: 290 千字

2018 年 12 月第 1 版 201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0 001 ~ 1 500 冊 定價: 88.00 圓

如發現印裝質量問題, 影響閱讀, 請與出版社發行部門聯繫調換。

清華大學中國經學研究院集刊

本刊入選『中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CSSCI) 2017-2018年來源集刊』

編委會 (按姓氏筆劃排列)

Robert L. Chard

古勝隆一

池田秀三

何志華

林慶彰

夏長樸

徐興無

郭鵬飛

陳鴻森

野間文史

張 勇

葉國良

單周堯

喬秀岩

楊 華

虞萬里

趙伯雄

鄧國光

■主 編：彭 林

■副主編：張煥君

目錄

■特稿

六經的價值論理	1	劉夢溪
經學、小學與考古學	4	馮時
經學的歷史貢獻與學科訴求	6	彭林
清代經學史的思考與現代啓示	9	程鋼

■經師研究

張舜徽先生的經學文獻觀	13	周國林
論張舜徽先生《清人筆記條辨》對經學的論說	25	劉韶軍
簡論張舜徽先生經學思想的特點	53	董恩林

■經學義理

論司馬光的禮治思想	57	張凱作
道濟天下——唐文治、曹元弼二先生經學大義比論	69	鄧國光

■經學史論

《周本紀》《魯周公世家》所載周公史事引《書序》考論 ——兼談司馬遷的撰史理念	85	駱揚
盛樂舞雩與孔子“風乎舞雩”之本義	99	曹勝高
劉向“自持其《穀梁》義”考論	111	鮑有爲

■經學故訓

讀俞樾《毛詩平議》札記六則	131	郭鵬飛
高郵王氏《國語》校詁商榷四則	145	戎輝兵

■經學文獻

毛奇齡年譜補輯簡編(1682-1713)	151	胡春麗
《四庫全書總目》經部勘誤舉隅	171	李堅懷
顧廣圻校修張敦仁翻刻撫本《禮記釋文》探析	179	侯婕
20世紀熹平石經研究鳥瞰	193	虞萬里

■資訊·札記

孟子“義襲”解	247	劉青松
韓大偉著《中國經學史·周代卷》概略	251	唐光榮
長歌行——撰成《中國經學史》前三冊偶感詩自注並序	253	[美]韓大偉
周易校勘記補遺(一)	257	[日]長澤規矩也撰 石立善整理
編後記	267	彭林

Contents

- Forum on Chinese Classics Studies LIU Mengxi; FENG Shi; PENG Lin; CHENG Gang
- On Mr. ZHANG Shunhui's Idea about Confucian Classics ZHOU Guolin
- On Mr. ZHANG Shunhui's Discussion about Confucian Classics in *Qingren Bijì Tiaobian* 清人筆記條辨 LIU Shaojun
- A Brief Discussion on Mr. ZHANG Shunhui's Academic Features about Confucian Classics DONG Enlin
- On SIMA Guang's Idea of Ruling by *Li* 禮 ZHANG Kaizuo
- A Comparative Study on the Thoughts about Confucian Classics of TANG Wenzhi and CAO Yuanbi TANG Kwokkwong
- Research on the Records of Duke of Zhou in *Shiji* 史記 which Quoted from Preface of *Shangshu* 尚書 LUO Yang
- Research on the Music and Dance in the Ceremony of Spraying for Rain CAO Shenggao
- Research on LIU Xiang's Thought based on *Guliangzhuan* 穀梁傳 BAO Youwei
- Notes on YU Yue's *Maoshi Pingyi* 毛詩平議 KWOK Pangfei
- Corrections to the Notes of Collation and Annotation on *Guoyu* 國語 of WANG Niansun and WANG Yinzhi RONG Huibing
- A Brief Supplement to the *Chronology of MAO Qiling* (1682-1713) HU Chunli
- Corrections about Category of Confucian Classics in *Complete Catalogue of Imperial Collection of Four* LI Jianhuai
- The Study on the Fuzhou Edition of *Liji Shiwen* 禮記釋文 Reprinted by ZHANG Dunren and Amended by GU Guangqi HOU Jie
- A Review on the Studies of Xiping Stone Classics in 20th Century YU Wanli
- The Correct Interpretation of Yixi 義襲 in Mencius LIU Qingsong

六經的價值論理

劉夢溪

二十年前，我在《中國現代學術要略》中曾經提出：“學術思想是人類理性認知的系統化，是民族精神的理性之光。”以我多年研習中國文化的心得，於今思之，中華文化能夠貢獻給人類的，我認為是人之為人的、群之為群的、家之為家的、國之為國的一整套精神價值論理。

這些價值理念的精神旨歸，是使人成為健全的人，使群體成為和諧的群體，使家成為有親有愛有敬的和睦的家，使國家成為講信修睦、懷柔遠人的文明禮義之邦。

中國文化的最主要的價值理念都在“六經”。“六經”指《易》《詩》《書》《禮》《樂》《春秋》六種文本經典。《樂》這一經沒有文本傳下來，是為“五經”。但也有一種說法，認為《樂》本來就沒有文本，它是跟《禮》跟《詩》結合在一起的，所以“禮樂”並稱，詩禮可齊觀。儘管後來看到的是“五經”，可是學者們習慣上仍然稱為“六經”，直到清代還是如此。

“經”是晚些時候的說法，開始的名稱叫“六藝”。孔子教學生，就是以“六藝”作為教材。但當時有兩種“六藝”，《易》《詩》《書》《禮》《樂》《春秋》是文本經典的“六藝”，另一種是“禮、樂、射、御、書、數”，我稱之為實踐課。這裏的“書”，指漢字構成的方式，包括象形、指事、會意、形聲、轉注、假借，後稱為“六書”，是為識字課。“數”是計算課，“射”是射箭，“御”是駕車。

文本經典的“六藝”又稱“六經”，孔子之前就有了。《周易》，相傳是伏羲畫卦，文王演易，孔子作傳。所以《論語》裏記載孔子的話，說“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詩經》是周代的詩歌，最早有三千多篇，經過孔子的刪訂，存留 305 篇，所以《詩經》也稱“詩三百”。《書》指《尚書》，是虞、夏、商、周上古時期的文告、文獻彙編。《禮》有三禮，包括《周禮》《儀禮》和《禮記》。《春秋》是魯國的一個大事紀，應該是孔子所作。如果不是孔子的原創，也是孔子在原有的一個大事紀基礎上加工潤色而成。因為記事簡，措辭晦，寓意深，由此形成史家稱道的所謂“春秋筆法”。

“六經”都經過孔子刪訂，是中國現存的最原初的文本經典，是古人智慧的結晶，也是現代人做人和立國的基本精神依據。20世紀的大儒馬一浮，稱“六經”為中國文化最高的、特殊的形態。大哲學家熊十力則說，“六經”是現代人做人和立國的基本精神依據。這些大判斷，時至今日也沒有過時，反而愈見其見解獨到。也可以說，中國文化的基本價值、核心價值，主要的都在“六經”。特別是誕生最早的《易經》，固然是無可否認的占卜之書，但它同時更是中國文化論理價值的淵藪。

近年我從“六經”裏面，也包括後來成為“十三經”的《論語》《孟子》《孝經》裏面，抽繹出幾組價值理念，包括仁愛、誠信、愛敬、忠恕、知耻、和同（“和而不同”）六組概念。我覺得這些概念範疇，是中國文化中的具有永恒性、普遍性的價值理念，既適用於古代，也適用於今天，不僅適用於中國人，也適用於全世界所有的人，是中國文化貢獻給人類的共同價值論理。今天的關鍵是需要讓這些價值論理跟現代人建立有效的聯繫，使之成為每個人精神血脈的一部分。所謂傳統文化進入教育環節，國學和教育結合，其精要之點，即在於此。價值教育是國學教育的核心，施行得體，可以補充百年以來施行的單純知識教育的不足。

班固在《漢書·藝文志》裏說得明白：“六藝之文：《樂》以和神，仁之表也；《詩》以正言，義之用也；《禮》以明體，明者著見，故無訓也；《書》以廣聽，知之術也；《春秋》以斷事，信之符也。五者，蓋五常之道，相須而備，而《易》為之原。故曰‘《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言與天地為終始也。至於五學，世有變改，猶五行之更用事焉。古之學者耕且養，三年而通一藝，存其大體，玩經文而已，是故用日少而畜德多，三十而五經立也。”此段話的意思，一是說仁、義、禮、知、信“五常”之德，具在“六經”；二是說《易》的地位最不同尋常，“與天地為終始”，是其他五“藝”之“原”；三是說由《樂》《詩》《禮》《書》《春秋》形成的五種專門學問，如同金、木、水、火、土“五行”的更替一樣，在不同的世代會有不同的呈現。

至於如何學習和研讀“六經”，班氏給出了“玩經文”的三字訣竅。“玩經文”的“玩”，是賞析、玩味的意思，絕不含玩耍之義。就是反復閱讀、反復賞析、反復研習“六經”的文本，其結果必然是讀書千遍，其義自見。《易·繫辭上》所說的“是故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也是這個意思。並不需要逐詞逐句的背誦，能够理解“六經”文本的義理精神、“存其大體”就可以了。而“六經”對於玩味誦習者所能够發生的影響，也不在於日常的有用還是無用，主要是通過對“六經”文本的玩味、賞析、研習，受其熏陶，可以收到“蓄德”的效果。“六經”是德教之書，於此可以得到證明。

“六經”文本讀起來不無煩難，但《論語》事實上可以作為“六經”的簡要讀本，如同馬一浮所說，《論語》裏面有“六藝”，《論語》可以直接通“六藝”。孔子講的道理，其

實就是“六經”的基本道理，只不過通過夫子的言傳身教，化作了日用常行，變得更為親切、近人、易入。這是“四書”中另外的《中庸》《大學》《孟子》，猶不能與之相比並者。《論語》是中國文化寶藏的宏明正學的第一代表，絕對堪稱“思無邪”的傳世聖典。傳統文化進入教育，首先應該讓《論語》成為各級學校的教科書，先選讀，後全讀，分級分層，循序漸進，由淺入深。而且應該以誦讀白文（不加注釋的文本）為主，祈以幾十年、上百年之後，使之成為中華兒女的文化識別符號。同樣，學習國學，我認為正途也應該從誦讀《論語》開始。

《周易》的“文言”有兩句話：“君子進德修業：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辞立其誠，所以居業也。”試想，人生在世，何欲何求？無非是讓自己修為得更好些，並希望事業有成，使成就感給自己帶來快樂與榮譽。那麼“進德修業”四個字可以說將人生志業的全部要義概括無遺。而“進德”靠的是“忠信”，事業有成就靠的是“立誠”。與人相處，則靠的是“和同”，即“君子和而不同”，即使不同，也可以共處於一個統一體中。所以我認為，一個是“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一個是“和而不同”，這是中國文化的大智慧，事實上給出了人類麻煩的解決之道。

作者簡介：

劉夢溪，1941年生，中國藝術研究院中國文化研究所所長、浙江大學馬一浮書院院長。

經學、小學與考古學

馮 時

經學不僅是中國傳統學術的根基，也是中國文化的根基。從六經皆史到從經學發展出史學子學，無不體現着經學作為中國文化淵藪的意義。

何謂經學？澄清這一問題的關鍵在於我們對“經”字的意義如何理解。《說文·糸部》：“經，織也。”甲骨文、金文“經”本作“𦉰”，象織機但布經綫之形，後則增加表意的“糸”符以為形聲字。古人紡織必先置經綫，然後才可能於經綫之中穿以緯綫，最終織成布帛，故無經綫則無以施緯，更無以成織。經綫作為紡織的根本，由此引申便可以經作為一切事物的根本，於是學術的根本也就稱之為經。

我們通常所講的經學其實只是指儒家的經典，從先秦六經，到漢初失《樂》而為五經，後歷七經、九經、十二經，終至宋而成十三經，雖有發展豐富，但皆不出儒家經傳小學。事實上，古代各種學術皆有根本之法，其皆稱經。如道家之經典稱為《道德經》，墨家之經典稱為《墨經》，醫家之經典稱為《黃帝內經》《外經》，地理家之經典稱為《山海經》《水經》，茶道之經典稱為《茶經》。很明顯，學術之根本稱經，不獨儒家一門而已。

儒家之經典，至戰國始見稱經。《莊子·天運》引孔子曰：“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自以為久矣。”又引老子曰：“夫六經，先王之陳迹也，豈其可以迹哉！”六經或稱六藝，經、藝同義，皆准臬常法之謂。

漢司馬談《論六家要指》評儒家經典曰：“夫儒者以六藝為法，六藝經傳以千萬數，累世不能通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理，故曰‘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故研究經學不能就經論經，讀經須先明小學，由小學入經學，這是清儒張之洞的明確主張。不通文字則無從通經，不明訓詁便無以明經。

小學作為經學的基礎可以正讀文字，從而達到對經義的正確理解。如《論語·學而》引孔子言：“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兩句文辭看似淺顯，實則頗具深意。一語遣詞為“說”，一語遣詞為“樂”，其所體現的真實意義究竟同或不同？學者或主兩字無別，僅述作之例，變文而已。此即不明小學之論。

“說”之本字作“兌”。《說文·儿部》：“兌，說也。”又《言部》：“說，說釋也。”顯

然,“說”字的本義是通過講解詮釋,使久郁於胸的疑惑豁然明白,心喜而不自禁。此聞道之喜也。故“兌”本作人開口喜悅之形,屬象意文字。而《說文·木部》對“樂”字的解釋則是:“樂,五聲八音總名。”甲骨文、金文的“樂”字本作木虞之上附以絲弦,或更從“白”,象手指撥弦奏之,屬會意字。故其表現的是由樂器的演奏而獲得的優美曲調,以樂曲樂人心。此愉樂之喜也。很明顯,這兩種喜悅所獲得的心靈感受是完全不同的,故孔子區別以兩字分別論之。聞道之徹悟樂在精神,故曰“說”;朋友相見之歡樂在於心,故曰“樂”。此即孔子所要表達的經義之本,可見小學明經的意義。

經有所謂作意與誦意,作意只有一種,這是經學文本所承載的內涵。誦意的發揮也早已定型,成為傳統經學的一部分,這些內容都不應有什麼新舊之分,而經世致用自因時代而異,也不會有什麼新舊差別。所以所謂新經學的提法似並不妥當。我們對於經典文本的研究,目的並不在求新,而在於求真,經學歷史雖然悠久,但這並不意味着我們對經典的理解與詮釋沒有問題,因此,探求真正的文本原義仍然是當下乃至今後經學研究的重要工作。強經以就我,不僅傳統經學的真正價值得不到彰顯,甚至將難以汲取經學中的優秀思想服務於當今社會。

新時代的經學研究必須結合新史料才能有所發展,這些新史料包括出土文獻和考古遺存,所以經學研究必須與考古學研究相結合。這種做法同樣不意味着經學可以區別為新舊,其只是在研究方法上更強調利用資料的廣泛與充分。

出土文獻對經學研究的推動作用非常明顯。如清華大學及上海博物館藏戰國竹書,對先秦六經的研究即具有普遍的意義,其不僅使我們有機會重睹兩千年前即已逐漸失傳的佚文佚篇,如《書》學系統的《志》、《禮》學系統的古文《記》和《春秋》學系統的《鐸氏微》等,使對六經的研究不斷深入,而且更將孔子通過六經之教建立儒家哲學體系的事實清晰地勾勒出來,意義自非淺鮮。如結合商周時代的甲骨文、金文史料,有關六經原典形成研究的突破就將是可以預見的成果。

誠然,考古學研究雖以對古代遺跡遺物的研究為主,但其促進經學研究的作用也同樣不可忽視。隨着考古學研究,特別是天文考古學研究的深入,這一事實已愈來愈清楚地顯現出來。如河南濮陽西水坡新石器時代原始宗教遺存文化內涵的揭示,為《尚書·堯典》四神章的正確理解提供了明確且完整的知識背景,甚至可以说,沒有相關的考古學研究,四神章所涉及的上古天文、思想與制度的千年疑案就幾乎不可能有機會被破解。很明顯,考古學為傳統的經學研究開闢了新途徑,這足以體現新時代經學研究的特點。

作者簡介:

馮時,1958年生,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

經學的歷史貢獻與學科訴求

彭 林

孔子是先秦文化的集大成者，刪述“六經”，創立了以仁禮學說為核心的儒家學派，將仁義禮智作為立德樹人的基本要素，將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走向天下大同作為立國的必由之路。經過春秋的王官失守，戰國的百家爭鳴，暴秦的驟亡，到西漢時儒學被定於一尊，這絕非漢武帝與董仲舒的私相授受，而是歷史的必然選擇。《漢書·儒林傳》記載“六經”被尊為“王教之典籍，先聖所以明天道、正人倫，致至治之成法”，這奠定了中國文化的底色，其後兩千餘年無論政權如何更迭，執政者是何民族，無不以儒學為國家的意識形態。

經過漫長的歷史發展，“六經”擴展為“十三經”，並且漸次出現為解經而起的傳箋、注疏、正義之學，以及文字、音韻、訓詁、版本、目錄、校勘等子科目，它們彼此支持，相互烘托，成為中國文化中特有的學科“經學”。經學是中華民族價值觀體系的載體，是人生理念、國家制度、社會發展模式的理論形態，是中國傳統文化靈魂與核心，在中國歷史上的作用無可比肩。《周易》的陰陽思想，《尚書》的德治思想，《詩經》的教化理念，《左傳》的民本主義，《周禮》的典章制度，《儀禮》的禮樂體系，是指引中國人走和平發展的道路，邁向天下為公的大同世界的寶貴理論，對中華民族的文化認同，以及道德理念、治國之道、思維方式、生活樣態的形成，乃至對史學、文學等的創作，都有重要影響。錢大昕《經籍纂詁序》云：“夫六經定於至聖，舍經則無以為學。”阮元說：“古書之最重者，莫逾於經。”又說：“士人讀書，當從經學始。”皮錫瑞《經學通論》說：“自天子以至於士庶，莫不讀孔子之書，奉孔子之教。天子得之以治天下，士庶得之以治一身。有舍此而無以自立者。此孔子所以賢于堯舜，為生民所未有，其功皆在刪定六經。”梁啟超說，宋元之後，《四書》成為全社會最基礎的讀物，故而成為大眾“一般常識之基礎，且為國民心理之總關鍵”。為此，從《七略》到《隋書·經籍志》，經過漫長的探索，確定以經、史、子、集為中國文獻分類的總綱，而以經部文獻為萬籍之冠，學者奉若圭臬，姚明達《中國目錄學史》推崇之為“視為天經地義，未敢推翻另創”，成為“中國目

錄學史上之主要潮流”。

清末民初，中國引進西方大學學科體系，這對中國的發展無疑具有積極意義。不幸的是，此事是在中國遭受列強入侵，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背景下完成的，由於政治上的不獨立與文化上的不自信，人們唯外來文化馬首是瞻。

西方的人文社會學科的體系，是基於當地歷史文化的產物，而人類文明是多元的，人文科學領域最具區域特色。在引進國外學科體系之時，我們理應經過必要的消化，充分兼顧本國固有的學術特點。非常遺憾，人們削中國文化之足，適西方文化之履，用西方學科體系來“規範”中國既有的文化體系，倉促而粗暴地將最重要的經學逐出了大學，從而鑄成大錯。

民國以來經學研究不絕如縷。儘管批判“尊孔讀經”成為思想界一時的主流，但充分肯定孔子與經學的知識精英依然在在多有。梁啟超《國民必讀基本書目》的第一本即是《論語》，他說：“《論語》為兩千年來國人思想之總源泉。”“《論語》字字精金美玉，實人類千古不磨之寶典。”《六經》“實為古書中之最見寶貴者”。梁先生說，《論語》某些內容“或不盡適於今日之用，然其根本精神，固自有俟諸百世而不惑者”。皮錫瑞對某些偏激之徒“欲以祖龍之一炬，施之聖經”的企圖表示憤慨。朱自清在他的《經典常談》中提倡國民的讀經教育，“在中等以上的教育裏，經典訓練應該是一個必要的項目”，“做一個有相當教育的國民，至少對於本國的經典，也有接觸的義務”。

在不少大學中，經典研究依然存在。如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的課程，即以經、史、小學為核心。王國維先生親自為學生講授的課程是《尚書》《儀禮》《說文》，他的學術論文集《觀堂集林》，依然以經史子集為綱，開篇即是“藝林”，即研究“六藝”的部分。被譽為“現代儒學三聖之一”的馬一浮先生說，全部中國文化都可以統攝於“六藝”之中：“國學者，六藝之學也”；“（六藝）是孔子之教，吾國二千餘年來普遍承認，一切學術之原皆出於此，其餘都是六藝之支流。”足見，經典之學的是非，公道自在人心。

經學的當代價值。改革開放以後，隨着經濟的飛速發展，回歸中華本位文化的意識開始湧動，經學是否還有現代價值，成為各界普遍關心的問題。2001年，饒宗頤先生在北京大學百年講堂發表關於“新經學”的演講中旗幟鮮明地指出，“經書是我們的文化精華的寶庫，是國民思維模式、知識涵蘊的基礎；亦是先哲道德關懷與睿智的核心精義，不廢江河的論著。重新論述經書的價值，在當前是有重要意義的”；“經書對推進現代精神文明的建設，有積極性的重大作用”。

近幾年，我國領導人在很多講話中表彰的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思想，天下為公、大同世界的思想，自強不息、厚德載物的思想，以民為本、安民富民樂民的思想，為政以德、政者正也的思想，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革故鼎新、與時俱進的思想，經世致用、知

行合一、躬行實踐的思想，仁者愛人、以德立人的思想，以誠待人、講信修睦的思想等，大多出自儒家經典，這代表國家肯定了儒家經典的當代價值。

經學的斷裂，已經跨越了五六代人，時至今日，中國的大學學科目錄中，依然沒有“經學”。正視經學歷史貢獻，繼承經學研究傳統，呼喚經學學科地位的重新確立，已經刻不容緩，具有存亡繼絕的意義。在舉國倡導民族自信、文化自信的今天，經學的歷史貢獻與時代價值正被越來越多的人所認識，而在當代的大學學科目錄中，經學學科依然缺位，這不公平，亦不正常。反思百年以來盲目追隨西方文科體系的迷悟，在大學中重建具有中國特色的經學學科，推動中國傳統文化的深入發展，該是提上議事日程的時候了。

作者簡介：

彭林，1949年生，清華大學中國經學研究院院長。

清代經學史的思考與現代啓示

程、銅

爲了思考當代中國經學應當朝哪個方向發展,我們或許應當對中國經學作一歷史的回顧,從中獲得啓示。

距我們時代最近的清代,恰好也是中國傳統經學的最後一個高峰。重視小學、經史結合是清代經學的顯著特點。清代經學的西學視野也值得我們研究與反思。

考據是小學的重要方法與門徑。清代經學的高峰時期,人們習稱爲乾嘉考據學。這說明考據學在清代經學結構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但是,當時已經有學者對這一稱呼有所質疑。因此,我們還是將清代學術的主流稱之爲清代經學爲宜。清代經學成爲中國學術史上最重要的學術形態之一,它上承宋元明,下啓近代,是連結古代與近代的橋梁,對當前中國經學的發展具有巨大影響與重要啓示。

清代經學大略分爲三期。

第一期,是從清初到惠棟以前,這一期與清朝的初期建國史相關,呈現出兩條脈絡。一條是政治脈絡:明代的衰亡與清代的初興。清代順治、康熙時期,就如何接納明朝留下的龐大遺產進行了整合。這一歷史時期有影響的大學者,大多出生於明朝,成長於清朝,他們承擔着在明清兩朝之間進行再認識的艱難使命,背負着對清朝重新認同的巨大壓力,最終在康熙年間完成了消化吸收明代治理體系的任務。宋明理學作爲治國的正統學說得到了確認。另一條是學術脈絡。它表現爲如下形態:顧炎武、黃宗羲對清代對立情緒的弱化;歷時 90 年,清代官修《明史》編撰完成;各種御纂、欽定的四書五經講本、講義成書。在這一時期,產生了闡釋傳統經學的新潮流,其代表人物爲: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閻若璩、毛奇齡等人。諸人均有很強的經世致用的情懷。其中,顧、黃、王的經世情懷比較直接,重在總結明代或明代以前歷史,對傳統的歷史與制度進行了全方位的系統反思。閻、毛的經世情懷則比較複雜:它的經世情懷既間接又直接。所謂直接,指的是他們均投靠清朝,其學術與清朝治國思想的變化趨勢有關聯。所謂間接,指的是閻、毛的經學著作開啓了學術的新方向與新形態。這喻示着經

學內部的重要變革，通過這一變革，經學恢復了學術活力，成為真正具有引領性的學術。

第二期，大體上從雍正時期發端，經歷乾隆朝，到嘉慶時期結束。雍正時期應當列入這個階段。這一階段，清代政治結構有所變化。清朝在比較成功地吸收明王朝的政治遺產之後，又面臨着如何突破明朝體系並確立新王朝治理體系的任務。雍正朝在治理體系的變革，體現了這種變化趨勢，並影響了其後的經學史。雍正在治國過程中，矯枉過正，過度強調能力的重要性，具有以能力為本位的傾向。這產生了兩方面的結果。其一，它使得以方法為本位的學術獲得了非常巨大的發展空間，這是隨後考據學取得良好發展的政治前提；其二，過强的方法本位既促進了經學的發展，也使得經學的豐富內容變得貧乏，經學原本的陽剛之氣變得柔弱，原本以經世致用為旨歸的經學，變成了具有極强的以方法為本位的考據學。這場變革最大的問題是，它的學術準備極不充分。在康熙後期，已經有人發現了依賴宋明理學培養文官的不足，但新的能够與理學並肩的學術體系並沒有產生。從行政角度看，雍正時期的變革是有成績的。但從學術文化的角度看，這是一場沒有學術準備的變革，必然存在粗糙武斷的缺失。這種缺失一直延續到了乾隆時期，乾隆時期在文治方面同時表現出兩種相互對立的極不協調的樣態：以文字獄、打壓名臣為代表的文化暴政，以弘揚文治、《四庫全書》為代表的文化整理成就。其根源或許在此。

在這個階段，清代經學發生了巨大變革，代表人物有惠棟、莊存與、戴震、錢大昕、段玉裁、章學誠、焦循、阮元等。這個階段的經學其實是一個具有內在邏輯的體系。惠棟是這個體系的奠基者和先驅，他確立了漢朝與漢學的特殊地位。戴震早期提供了更為嚴格的經學方法論，後期則試圖以小學為基礎，重建與理學抗衡的形而上學體系，這些都為後學指出了進一步發展的方向。錢大昕以史學名家，主動與戴震的學術路徑拉開了距離。章學誠則更深入地思考了史學的學術意義，對戴震為代表的乾嘉考據型經學多有批評與保留。焦循、阮元等人引入了歷史意識，開啓了新型的經學思考，對清代此前的學術史進行了理論反思與綜合整理。

清代經學原本以經世致用為宗旨，主動與宋明理學相區分。清代經學家視考據為實學，理學為虛學。但最終的結果，考據型的經學家雖然成果累累，為經學打下了深厚基礎，但這種專門學術與經世致用之間仍然有很大距離。且存在行動意識弱化、行動力缺乏的重大問題。章學誠從致用視角對考據型經學進行了深刻批評。這個階段的一大成績，是經學在學術上建立了牢固的基礎，使得考據型經學取得了牢固的學術權威，在學術與政治的互動中，學術取得了主動權。

與學術方法的傑出成就相比，乾嘉時期經學家似乎說不清楚經世致用的這個